

三十年來中國教會史資料工作舉隅

林雪碧

2001年，林治平等學者在台灣中原大學召開了「海峽兩岸教會史研究現況」學術研討會，當時宣稱中國教會史研究已由「險學」發展而為「顯學」。當然，這是以基督新教為主軸的研究趨勢，然而套用在中國天主教會史研究，也無不可；即使未成顯學，但是多年來的發展，也確實已經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。

中國天主教會史之研究起初以外國傳教士為主，讀者也以教內人士為對象。至20世紀初，馬相伯及英欽之重整教會故舊文獻，又協助陳垣進行相關研究，1917年陳氏發表《元也里可溫考》，開創了教會史研究的新局面。其後方豪、徐宗澤等傑出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。1949年後，方豪在台灣繼續鑽研教會史，輔仁大學也著力推動教會史的學術發展，台灣成為研究中國教會史的重鎮。相反，在大陸地區，礙於政治形勢、意識形態的局限，有關教會的大大小小的文章，幾乎無一例外地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，傳教士即為侵華敵人的幫凶。1956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便曾下達指令要求學者寫作「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」，其後李時岳發表《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8），即為個中代表。對教會作出完全負面評價的情況，直至80年代才開始有所轉變。大陸學者跳出「文化侵略」的框框，進而以中西文化交流，甚至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去審視教會歷史，逐漸承認傳教士傳播西方文化的積極意義。90年代以來，大批學者加入教會史研究之列，研究領域不斷拓闊，成果也相當豐碩，大有蓋過台灣之勢。而澳門及香港則先後成立了利氏學社、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及原道學會，積極推動了教

會史的研究，前兩者在澳門及香港本地教會史研究方面成績尤其突出。

所有學科的研究，都需要運用資料，歷史學如脫離了資料便無以立足，一切都會變成毫無根據的小說故事，再精闢的見解也都只是憑空創作。歷史學者所使用的資料，有書刊報章、檔案文獻、考古實物等各式各樣，近代的更有口述訪談。資料，就是歷史學者的生命之源，資料工作無疑是歷史研究的基礎；著名歷史學家如傅斯年、方豪等甚至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，以致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。

雖然今日網絡發達，搜尋資料比從前方便得多，但也正因為太方便，資訊泛濫，搜索所得往往有很多重複，或者虛假資料；所以專題資料的彙編及目錄整理，省卻學者訪尋與舟車之苦，對推動研究有著正面的助效。隨著教會史研究受到重視，相關領域的資料工作亦相繼展開，早期有《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》（北平：故宮博物院，1932）、《天主教東傳文獻》正、續、三編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65-66, 1984），近三十年來的出版豐富，以下簡單介紹幾種較有特色的專書。

1. 明清教會文獻

在各項中國教會史專題資料整理當中，最多的是明清之際的教會文獻，其中又以涉及耶穌會的為大宗。當時來華傳教士認為刊印書籍是傳教的利器，因為口講親授只能及於當時當地，但書冊則有助流傳各地，及至後世；因此當時傳教士奉行刊書傳教。而他們不但有教理、神修的著作，亦有天文、曆法、農政、水利的專書，可謂包羅萬有，這都是西學東傳的重要文獻。明清傳教

士著作甚豐，其總數至今未有確實的數字，多年來中外學者一直努力整理。成果有《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》（台北：輔仁大學神學院，1996），上海徐家匯是中國教會的重要據點，為全球收藏明清教會典籍最多的三家之一，本書收錄了徐家匯藏書樓珍稀閣圖書 37 種，大部份為海內孤本，包括利瑪竇的〈齋旨〉，又如載有二百年來中國各地教堂的所在地及史蹟的〈天主堂基石記〉，都是珍貴的資料。此外，尚有《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》（台北：台北利氏學社，2002），《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，2003）等等。

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）收錄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涉及天主教的一批檔案，這些檔案來自清朝內閣、軍機處、內務府等機關，有皇帝的諭旨，亦有官衙之間的往來文牘，多數檔案為首次公開。本書有助大家瞭解清朝中前期教會在華各地的歷史，以及傳教士在清宮當差的情況。

《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4），由於梵蒂岡圖書館地位特殊，所藏不但有來華耶穌會士的著作，亦有其他來華修會的中文文獻、中國士大夫與傳教士論辯的著述，以及傳教士由中國帶回歐洲的各種中國書籍。這批資料中有很多關於科技的文獻，如傅聖澤（**Jean Francoise Fouquet**, 1665-1741）因在清朝任職欽天監，返回歐洲時便帶回了大量工作材料，這對研究他的個人生平及清代科技史都非常重要。

2. 區域史

二次大戰後興起了區域研究，顧名思義就是以區域為研究對象。區域研究從一地一區開始，注意該區的人文、地理、經濟等特性，從而檢視其內部運作機制，逐步深入探討其獨特的歷史現象與意義；繼而與其他地區比對，拼構成整體的圖象。

《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8）。專門收集有關臺灣教會史的書刊甚少，本書則一共收錄了 5 篇，包括有清朝總理衙門的〈教務教案檔〉中有關臺灣教會的教案資料。有〈涂敏正神父日記〉，涂敏正（1906-1982）為台灣第一位本地出生的神父，在日治時期曾代理日本天主教台灣教區區長；這日記除了教會事業的記載外，還有日本投降及二二八事件等的見聞。有〈迷信歌〉，當中的歌謠是昔日神父透過歌曲傳佈教理，好使民眾能脫離民間的迷信習俗，歸向天主。有〈臺灣拾掇——伴隨使節記行〉，是日籍神父早坂久之助（1883-1959）在 1923 年隨教廷使節赴台巡視時的筆記，內容既有記述 20 年代台灣教會的事業，也有當時的社會實況。有〈員林天主教青年會規則〉，記錄了該教友組織的規章架構。除了〈教務教案檔〉較為人熟識，其餘資料均是坊間少見，為研究台灣教會史的重要材料。

方志是有關一地之百科全書，是全面而有系統地記述本區的山川地理、社會風俗、重要事件等等的資料性文獻，其修編由政府負責。中國一向有修志的傳統，藉以記錄一地的社會變遷；當然也藉以展視一地的財力政績，此所謂盛世修志，志載盛世。方志很早就有記載關於天主教入華的事蹟，明末清初以及鴉片戰爭後，來華傳教士增多，教會活動頻繁，方志的相關記載便也增多。當中的記述大致可分為 4 類：當地教會概況、教友人數、教

會建築及重要事件。教會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，朝廷以至地方官都不得不重視其活動，因此，方志的資料非常豐富，不但有天主教會的，基督教以至東正教的都有。《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》（上海：東方出版中心，2010）便輯錄了明清至民國期間各級官修方志中有關基督宗教之資料，對研究昔日各地教會的情況很有助益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因政治運動頻仍，修編地方史志工作一度停頓，至 80 年代國務院決定重修方志以反映社會變遷，隨後各地省市紛紛成立地方志小組以進行修編工作，陸續出版共約 3000 冊新方志。這批新方志大都載有教會史料，篇幅長短不一，視乎編者的能力與取態，有的只有數十字，也有的是長篇鉅著。這些資料有很多一直被列為「只供內部使用」，如今卻向外界披露，學者因而得以對國內，尤其是改革開放前的情況有更多的認識。例如大躍進時期，政府嚴厲執行反宗教政策，過往學者只能籠統地說此一時期各地宗教活動中斷，但新方志卻仔細地顯示了各地的差異，有些地方宗教活動如常。《中國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資料》（香港：基督教協進會，聖神修院神哲學院，2006）把數千冊新方志中的教會資料一一收錄，2012 年增訂版，又把幾年間新出版的方志資料加入其中，為研究當代中國教會的重要工具。而此一彙編工作，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負責，亦為香港天主教與基督教首次相類性質的合作。

3. 中梵關係史

梵蒂岡教廷是普世教會的中心，其對外關係，不講求政治平衡、軍事保障或經濟利益，她關切的是精神、宗教層面的事。但是，作為一個國家，又不能完全不依從俗世的外交規範。所以政

教往往糾纏不清，不可能完全分離。中梵關係，無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都不是一帆風順。民國初年，便因法國保教權問題，相方難以正式建交；1949 年後，兩岸分治，教廷雖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，眼睛卻注視著大陸。

《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》（台北：輔大天主教史料中心，2002），是至今唯一的中梵資料彙編。雖說是 60 年史料，其實其資料自 1922 年，即是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來華開始。由於本書由台灣外交部委託編輯，所以資料豐富，包括來自國史館、外交部、駐教廷大使館等官方部門的電文、官員信札，從中可窺知兩國時有角力時而互助，前人為維繫兩國關係，殊不容易。此外，書中又收錄了台灣駐教廷使節向教宗呈遞的國書，教宗每年的和平日文告及台灣總統的回應文章等。此書出版至今 17 年，其間教廷與兩岸關係已發生變化，尤其去年與大陸簽訂秘密協議，足以左右日後的發展，期望不久會有更多政府檔案解密，讓歷史學人、教友更能瞭解教廷與祖國的互動。

教廷關心大陸教會的福祉，中共建政後強力推行三自教會，大舉驅逐外籍教士，禁制國際性教友團體，造成兩者關係難以正常化。《中國近代教難史料 1948-1957》（台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主要引用了香港公教報在大躍進前十年有關大陸教會的報導，整理後並加編者評論而成書。報導內容大多是神職人員被捕、教產被充公等消息，亦有編者整理後得出的在上海下獄的主教神父名單，附錄中並載有教宗庇護十二致中國教會的兩通文件。書中收集的資料距今已超過 60 年，但是大陸教會仍處處受制，千萬教友遭受壓迫甚至迫害，至今仍然時有發生。

4. 教會大學史

辦學興教是教會事業中重要的一環，教士可以藉著教學接觸民眾，並傳揚信仰。教會學校在中國確立了歐美教育模式，並有系統地傳播西方文化知識，而教會大學的畢業生在各個領域中都佔據重要位置，如國民黨元老于佑任、劉少奇妻子王光美，日本首任駐華全權大使小川平四郎等，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及至新中國成立，部分教會大學遷播香港或台灣，也有的在院校調整時，各院系分別被「調整」到其他學府，結束了教會大學在大陸的歷史。

很多大學都會編寫校史，但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研究起步卻很遲。1989年6月，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討會，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，是為此項專題研究的里程碑。教會大學曾被視作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國的工具，又經歷戰火、遷校等影響，其檔案文獻遭到嚴重破壞。1993年，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了一個相應的研討會，專事討論相關文獻的保存、整理與研究，及後發表了《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1998）。本書收錄的資料來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、上海市檔案館及兩間院校的檔案館，當中有大學的章則、統計、報告、學生成績等資料。由於基督教主辦的大學遠教天主教的為多，編輯者亦為基督教學者，所以本書資料也以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轄下的13間大學為主，但亦有天主教所辦的輔仁、震旦，及較少人留意的天津工商大學。從資料可以得見輔仁大學在國學研究方面成績斐然，與一般教會大學注重科技工商等西學新知相比較，別有意義。而上海市檔案館儲藏了大量教會大學的資料，包括震旦大學檔案1249卷都收錄在書中。

旁觀者可能把資料工作視為打字影印的刻板服務，實情是這項工作不但耗費時日，又需要調用多方資源，除了收集，還要做版本校勘，確定資料真偽。因此，要編輯一份具有實用價值的資料彙編極不容易；非使用者斷難體會其可貴之處。三十年來，資料彙編的發布引起了學者對該專題的興趣；而教會史研究愈趨興盛，也催化各個專題的資料整理工作，兩者互相帶動。三十年前，胡振中主教以朱熹〈觀書有感〉：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勉勵《神思》作荒漠之甘泉。而資料工作就是活水，灌溉著教會史的研究。